

正统史笔「体面背后」的祛魅之旅：刀尔登以清醒视角重审被道德绑架的个体与历史逻辑

JokingKong · 2026-07-21 12:42

我们读历史，总爱抱着笃定、清晰、简单、直白的判断，把千年的人事装进非黑即白的框子里，把复杂的人性裁成忠奸对立的纸片。从蒙童听评书起，就知道纣王是千古暴君，吴三桂是卖国奸贼，严嵩是弄权佞臣，东林党是正人君子，冯道是无耻贰臣。这些结论像刻在碑上的字，风吹雨打了千百年，我们便以为那就是历史本来的模样，拿着前人递来的标尺去丈量过往，站在后世的高地上指点古人的善恶，却很少低头看看，那标尺本身，是不是早就被权力与偏见磨得变了形，也很少停下来想想，那些被钉在耻辱柱或供在圣贤祠里的人，原本也有血肉，有挣扎，有身处时代洪流里的身不由己。

直到读刀尔登的《旧山河》，仿佛有人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“历史的旧门”，带进了一股清冷而透明的风。这股风不带任何预设的温情，也不打算继续维持那种你好我好的虚假和谐，它只是诚实地吹过那些神龛与牌位，让灰尘落回土里，让真相显露原型。便正是这种坐在旧宅天井里，看阳光一寸寸剥落神话外衣的过程。这书里没有那种高亢、宏大、虚伪、矫情、自欺欺人的史学叙事，只有一种近乎日常的、带着人情味的冷峻。

我们太需要简单的答案了。辨别真相是累人的事，最容易的办法，便是把辨别是非的负担交出去，让别人来告诉我们谁是好人的事，谁是最容易的办法，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，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‘坏人’，我只负责吃掉他。」千百年过去，我们依然在重复着同样的事，把历史简化成一出善恶有报的戏文，把王朝更迭归罪于几个奸佞小人，把制度性的溃败，简化成道德的沦丧。

而历史从来都不是客观的记录，而是胜利者书写的道德宣言。武王伐纣，不过是西土小邦对中原共主的权力争夺，却非要先在誓师会上把纣王骂得十恶不赦，把一场权力更迭，包装成恭行天罚的仁义之举。后世的儒生更是变本加厉，把能想象到的所有罪孽都堆在纣王身上，仿佛把他骂得越狠，周朝的政权就越有合法性。就连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的史实，也被孟子强行推翻，只因为“以至仁伐至不仁”，怎么会有如此惨烈的厮杀？我们总以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，却很少深究，胜利者为什么要这么写，他们又在这些书写里，藏了怎样的私心。就像严嵩被钉在明朝第一奸相的耻辱柱上，几百年里戏曲小说反复演绎，把所有的坏事都归到他头上，却少有人去想，一个小心谨慎、柔媚取容的内阁首辅，如何能担得起一个王朝衰败的全部罪责。正如书中戳破的：「本地流行整体论：整体决定部分，‘本质’决定各种‘非本质’的东西。整个儿的严嵩既然是坏人，那么，各种坏事，他就算没做，大概也想要做的。」这种整体论的逻辑，贯穿了千年的历史书写，一旦被贴上“奸邪”的标签，便百口莫辩，所有的行为都被赋予恶意的解读，所有的过错都被无限放大，而造就这一切的制度本身，却安然躲在道德审判的背后，毫发无伤。

东林党与阮大铖的恩怨，便是这套逻辑最极致的体现。阮大铖本是东林一脉，不过是因一个官位的争夺与同门生了嫌隙，便被死死钉在小人的耻辱柱上。他想回头示好，东林党人却拒不接纳，反而愈发声讨，争相以毁阮博高名，硬生生把一个本可回头的人，逼到了遗臭万年的路上。书中一语道破其中的关节：「东林之集矢于阮大铖，因为团体需要公敌，来把集体凝聚起来；更重要的是，好人主义需要坏人，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。」一个团体需要一个公敌来凝聚人心，一套摇摇欲坠的制度需要一个坏人来承担所有骂名，这便是千年里反复上演的戏码。骂宦官的士人，从不会主张废除宦官制度；骂皇帝暴虐的儒生，从不会质疑皇权本身；骂奸臣误国的清流，从不会反思这套官僚体系的病根。他们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几个替罪羊身上，仿佛除掉了这几个坏人，天下就能太平，仿佛骂倒了这几个奸邪，自己就站在了道德的高地上。

这种道德审判的背后，是一套早已扭曲的道德体系。我们总以为传统礼教是教人向善，却很少看清，它早已从鼓励美德的指引，变成了压迫人性的规训。书中最振聋发聩的提醒，莫过于那句：「劝善与逼善是有分别的，因为道德命题并不对称。我们可以说让梨是高尚的，而不可以就此反推不让梨就不高尚，不道德，无耻，该打屁股。提倡美德，是鼓励性的；推行规范，是禁止性的。规范禁止杀人，但我们很少会在日记里写下‘今天又没杀人’，以为做了好事，沾沾自喜。反过来，人没有达到某种美德，不意味着其在道德上有缺陷。经常发生的是，那些鼓励性、建议性的伦理信条，被不正确地逆推后，产生了一种压迫性的道德环境。」

千年来，我们一直在做这种逆推。你不为王朝殉节，便是不忠；你不为丈夫守节，便是不贞；你不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，便是自私；你不肯跟着众人一起骂奸邪，便是同流合污。道德从向上的、自愿的修行，变成了向下的、强制的砍刀，砍向每一个不肯按剧本行事的人。雍正给钱名世题下“名教罪人”的匾额，命人挂在他家门口，还要地方官定期检视，不许遮蔽，又逼着满朝文官写诗痛骂，让钱名世自己掏钱刻印成册，颁行天下。他不用杀了这个人，只用“名教”二字，就能把一个人的尊严碾碎在地，让他终生活在羞辱里，这便是专制最阴狠的“心刑”。而那些奉旨写诗骂人的官员，未必真的鄙夷钱名世，却不得不跟着挥起道德的砍刀，因为在这套体系里，不跟着骂，你就成了下一个被审判的人。

同时，在我们的惯常思维里，历史常常是一场关于道德的接力赛。然而，刀尔登在《鸿罹》中却提醒道：「反抗者填写着自己的新词，用的却是对方的曲谱。中国古代虽有专制，远非完美，但在这一点上，已有其大概。」这段话如同一声低沉的叹息，道尽了数千年来智力活动的悲剧性。那些聪明的头脑，在权力的舞池里跳了一辈子，自以为在反抗，其实连舞步都是对方编排好的。这种思想上的闭环，让我们的历史看起来像是在不断更迭，实则只是在那袋毒面粉里挑拣颗粒，结果自然是不断地腹痛，不断地幻灭，不断地在那片旧山河里打转。

世人太擅长用批判别人的恶，来掩饰自己的怯懦与自私。书中说：「改善自我评价最便捷的办法，是发现别人的错处，力批之，特别是对那些自己也犯过、有可能犯、想犯而不敢犯的错误，更要大力挞伐。」我们骂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却不肯看他在忠孝之间的两难，在降顺与降清之间的算计；我们骂冯道历仕四朝十一主，是无耻贰臣，却不肯看他在兵荒马乱的五代里，如何周

旋于各方势力，救下了无数黎民百姓的性命；我们骂杨朱“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”是极端自私，却不肯听他背后那句最朴素的呐喊：「人的生命属于自己，是最简单也最经常被忘掉道理，因为有那么多力量致力于让大家想不起这个道理，而且总是成功。」

这套以集体、以国家、以天下为名的叙事，从来都在教我们如何牺牲个体，如何服从集体，如何为皇权尽忠，却从来不肯告诉我们，个体的生命本身，就有不可侵犯的价值。杨朱的思想被骂了两千年，只因为他戳破了一个真相：所有以天下为名的索取，都是从拔一根毛开始的，今天你愿意为天下拔一根毛，明天就有人要你一条胳膊，后天就要你的整条性命。而那些口口声声喊着要利天下的人，往往是最想从天下人身上攫取利益的人。就像书中写的，那些在长平坑里被坑杀的四十万降卒，不是没有反抗的机会，只是他们习惯了服从，习惯了把命运交给别人，习惯了跟着众人一起赴死，却不敢站出来反抗。「反抗还需要个性，赴死只需一种态度；反抗还需要智力，而赴死是最愚昧的人也会做。」这句话道尽了千年里，个体在权力面前最可悲的处境。

更可悲的是，那些想要反抗的人，也往往困在权力的体系里，无法挣脱。从唐甄喊出“帝王皆贼”，到李贽追求不受管束的自由，再到鲍敬言提出“无君论”，古代那些最出色的头脑，始终没能跳出皇权的框架。他们在权力中反对权力，在体系中反对体系，用着对方提供的工具，填着对方定下的曲谱，哪怕填了再新的词，也终究跳不出对方的舞步。正如书中写的：「他们被迫在权力中反对权力，在体系中反对体系，皇权和儒学给反对者设下了议程，令他们的思考，都用着对方的工具，他们的活动，也无不在意料之中，就连他们的反对本身，都成为对方的养料，用来加固自己。」

我们对于知识的接受，往往也是一种立场的选择。正如刀尔登在《摸一烟一兔》中所写：「人的意见，多半在早年就固定下来，以后再学新知，欢欣鼓舞，但一有机会，还是会回去。」这种认知的惰性，构成了历史最深厚的底色。人们并不真的在乎事实，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舒适区，是在那个熟悉的、狭窄的、阴暗的、安全的认知洞穴里继续安睡。「再杰出的头脑，也没办法超出经验（包括为自己所知的他人经验），凭空想出什么来。」

于是，历史的经验成了一道厚重的围墙，墙内的人相互取暖，墙外的事物被视为妖邪。

论及儒家，它一半是人格的理论，一半是君人的理论，从它被皇权选中的那天起，就注定了要成为专制的帮凶。汉武的“独尊儒术”，从来不是真的尊崇儒学，而是用官吏选拔制度，把天下的读书人都绑在了皇权的战车上。「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，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，回来已变成儒士；代复一代，儒学传家，举止皆在其中。」当读书人的唯一出路是做官，唯一的买家是皇权，他们便只能收起自己的棱角，磨平自己的思想，变成皇权需要的样子。这套体系里，最不缺的就是趋炎附势的官员，最难得的是独立思考的士人；最常见的是为皇权唱赞歌的文人，最稀有的是敢为个体争权利的思想。

而专制最可怕的地方，不仅在于它会用暴力镇压反抗，更在于它会主动驯化人心，让民众变得盲从、麻木、互相倾轧。书中那句被标记得格外醒目的话，道破了专制最核心的秘密：「事实上，统治者不但喜欢降低人民的智力，也喜欢降低人民的道德水准，尽管他们常标榜以德治天下。没有原则的人群最容易驱使为恶，用利益，用危险，用激情，用随便什么东西。人类历史中横死的

弱者，几乎全部是被同类杀死的。人们屠戮异己的同类，也就承认了一些理由，同样的理由，也将被用来屠戮他们。许多理由，只因为涉及更大的范围，就好像据有了人伦上的更高地位，人们一直轻易地接受这些东西，也一直被训练着如此。他们成群结队地干这干那，自以为转移了责任，但这种虚假的安慰，早晚要剥掉。那时候，一直鼓动、吹捧你的人，不见了踪影，而最后的审判是逐个的——如果你不信这一套，还可换个说法，每一个人都得独自死去。」

权力腐蚀社会，掌权者首当其冲。一个王朝从建立到覆灭，不过是权力不断集中，不断腐蚀人心的过程。有暴君而有暴臣，有暴臣而有暴民，最后打个遍地瓦砾，然后从废墟里，再长出一个新的集权王朝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千年不变。「古代的集权制中国，亡于乱，也兴于乱。」帝国总能把自己的失败，化为整个社会的失败，把自己的死亡，化为天下大乱，然后在民众对秩序的极度渴望里，完成一次又一次的重生。这种循环不仅是一种政治现象，更是一种精神疾病。制度恶化激发人性之恶，人性之恶反过来巩固制度，最后打个遍地瓦砾，剩下些得了失忆症的幸存者，白手起家，迎接下一个轮回。这种宿命感，沉重、压抑、粘稠、挥之不去，而那些在乱世里流离失所的百姓，那些在权力倾轧里身首异处的士人，都成了王朝重生的祭品。

谈及自由，刀尔登的笔触越发充满戏谑。他在《李贽的自由》里说，卢梭感叹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，未免有些“娇气”。在他看来，「个人的自由，必得向社会中寻，正如社会的成功，必得着落到个人身上。」只要这些枷锁不是绝对的，人尚且有腾挪的空间。可惜的是，在权力的逻辑下，我们往往习惯了将自由上缴，以换取那点微不足道的安全感。

这种安全感的渴求，催生了一种独特的人格——“鲋人”。在《鲋人》这篇文章里，作者描摹了一群害怕自由、担心亡羊的人。这些人离了群体就不知道如何迈步，离了强者就不知道如何发声。「鲋人作为个人，总是失意，所以迟早联合在强者的麾下，把自己的事务，重又提交给强者，替他做主，替他发表意见，尽管他往往相信那确是他自己的意见。」这种人性的幽暗与懦弱，在漫长的专制史中被巧妙地制度化了。它让个体在集体主义的温暖中逐渐萎缩，让独立思考变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异端。

更令人脊背发凉的，是关于“平庸之恶”的本土化解读。在《无名英雄》中，他一针见血地写道：「将自己委身于人，一大好处，是道德上不用自决，十分省心。比如一个孩子在吃一块肉，我若劈面抢来，未免不好意思，若有上司一声令下，夺了就走，心安理得。」这种“省心”的逻辑，是权力吞噬人性的润滑剂。当道德决策权被让渡给一个抽象的集体或一个具体的上司时，罪恶便可以披着任务、职责、使命的外衣，在大街上横冲直撞。

在这种注脚史里，事实是可以被随意揉捏的泥团。在《数典忘祖》中，作者感叹道：「多数时候，人并不是按照事实改变自己的看法，而是相反，按照看法选择事实。」我们有一种惊人的能力，可以坚守那些荒谬的偏见而丝毫不感到愧疚。这种勇敢是令人绝望的，它意味着我们决定拒绝做一个更好的人，决定在二十一世纪继续坚信大地是驮在大象背上的。这种对真相的傲慢，是通往文明之路上的最大障碍。

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，是没有自由人的。这句话在《知其不可而想之》里不仅是一个论点，更像是一个魔咒。私刑与公法的进退，法的专制与民间的暴力，构成了一幅混乱的图景。在这种图

景下，公权力的会聚往往建立在私权的退让与驯服之上。正如《救星魏忠贤》中所言：「公权，无论是借来的，还是抢来、偷来、骗来的，无一丝一毫不取自私权。」这种掠夺是如此理所当然，以至于被掠夺者往往还在渴望一个更好的掠夺者，将其视为“救星”。

在权力的格局中，性格往往比智力更具决定性。在《性格决定命运》里，刀尔登揭示了强者的逻辑：「人在社会中的力量，手足居末，头脑居次，性格居首；所以第一要务，是找到性格比你弱的人，驾驭他们。」所谓皇帝，就是有亿万个性格比他弱的人对他让步。这种从属关系，构成了社会的金字塔。在这个塔尖之下，所有的教育都趋向于训练，所有的表态都趋向于恭顺。在《知所炯戒》中，他写道，识字不多的人本分是望尘舞拜，而写诗弄文的人，其本分则是被乾隆这样的专制者“修书”——以修书之名销毁知识。

这种对知识的敌意，是权力的一种本能。在《寓禁于征》中，他冷冷地写道：「毁灭知识的乐趣，可能仅次于，甚至更强于获得知识的乐趣。人类出一个阿基米德，不知要攒多少好运气；要杀死一个，只需兵士之一击。」这种对文明的摧残，往往披着正义的外衣。统治者不仅喜欢降低人民的智力，更喜欢降低人民的道德水准。正如他在《胡化》里那句最深刻的提醒：「事实上，统治者不但喜欢降低人民的智力，也喜欢降低人民的道德水准，尽管他们常标榜以德治天下。没有原则的人群最容易驱使为恶，用利益，用危险，用激情，用随便什么东西。」

我们总说“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”，可千年来，我们看了无数的历史，却依然在同一个圈子里打转。因为我们总在看王朝的兴替，看权力的更迭，看忠奸的斗争，却很少去看制度的病根，很少去看个体的处境，很少去怀疑那套被奉为圭臬的叙事本身。我们骂了千年的暴君，却依然崇拜强权；骂了千年的奸臣，却依然热衷站队；骂了千年的专制，却依然渴望一个救星来拯救自己。就像书中说的，多数时候，人并不是按照事实改变自己的看法，而是相反，按照看法选择事实。我们总能从历史里，找到支撑自己观点的证据，却不肯面对那些与自己看法相悖的真相。

在通俗历史读物泛滥的今天，太多写历史的书，不过是把旧的忠奸叙事换了个更热闹的讲法，把脸谱化的故事包装得更吸引人，却从来没有跳出那个既定的框架。而《旧山河》最珍贵的地方，从来不是给了我们一套新的历史结论，而是教会我们如何去怀疑，如何去思考，如何去看那些被历史叙事掩埋的个体。你或许会觉得这本书过于冰冷。但其实，在这种冰冷之下，有一种极其温厚的人文关怀。它没有宏大的叙事，没有激昂的口号，只是从一个个具体的人，一件件具体的事入手，轻轻戳破那些流传了千年的神话，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复杂，人性的多面，制度的困境。它不教我们怎么去骂古人，而是教我们怎么去看清当下；它不教我们怎么去评判历史，而是教我们怎么去守住自己作为个体的清醒。

刀尔登的文字，像是在那座名为“中国历史”的陈旧宅邸里，点燃的一盏孤灯。它照见的不是什么灿烂的文明，而是一个个在权力的挤压下弯曲、变形、痛苦而又麻木的灵魂。它让我们看到，那些被我们赞颂的盛世，往往建立在对个体意志的彻底剥夺之上；那些被我们唾弃的乱世，有时反而是思想最自由的缝隙。

千年过去，那片旧山河依然在那里，那些藏在历史褶皱里的困境，那些被驯化的思维，那些对权力的依附，对集体的盲从，对个体的漠视，也依然在我们身边。我们读《旧山河》，从来不是为

了给千年前的古人翻案，也不是为了在历史里找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，而是为了从那片旧山河里，看清我们自己身处的位置，看清那些依然在束缚着我们的思维枷锁。毕竟，历史从来不是过去的事，它就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观念里，藏在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里，藏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里。而一个人真正的清醒，从来都是从怀疑既定的答案，看见具体的人，守住自己的独立思考开始的。



扫码进原文:

<https://ximutan.com/forum/post/10>

以书会友，谈论天下

© 西木读书论坛